



中国不断增长的 对外依存度

Li Cui

中国的经济繁 荣与世界经济 日益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

图片说明文字：上海的一个集
装箱港口。

快速增长的外贸成为中国过去30年骄人经济表现的关键，不过传统的观点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大体是国内驱动的。按照这一观点，中国利用其充裕的劳动力，把进口的投入品组装成低技术含量的消费品和资本品出口，这使其成为世界工厂。

这种加工贸易通常很少对国内经济增加价值，因为出口品中的进口比例较高。结果，有观点认为，全球需求的变化或汇率的变化将几乎不对该经济的贸易平衡或增长产生直接影响——出口的任何变化将在很大程度上被进口的变化所抵消。

那么，贸易如何促进增长呢？答

案是通过先进技术的转移。对中国贸易的这种讽刺性描述成为许多正式分析和政策讨论的基础，甚至得到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Shu 和 Yip (2006)发现，相对价格的变化对中国的出口和贸易平衡效果较小，这种结果促成了中国作为加工中心地位的形成。

但是，对中国经济的这种解读并不能反映当前的现实。尽管它可能描述了改革初期阶段的中国经济，当时中国国内缺少技术知识，不得不依靠进口中间产品和资本品用于生产和出口（见 Lemoine 和 Ünal-kesenci, 2002），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研究显示，

近年来这种描述可能已变得不那么准确了 (Cui 和 Syed, 2007)。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内比例提高了, 其产品变得更加复杂, 这部分是由于大量的投资和技术升级, 它们已经扩大了该国经济的生产能力。

地区纵向一体化的进展 (一家公司拥有其上游供应商和下游购买商的程度) 已经促进了全球供应链中中国国内增加值的扩大特别是在非尖端行业。这些发展与产品构成的转变 (这种转变可能使出口对外部冲击的反应更为敏感) 一起, 意味着, 中国贸易平衡和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和汇率变化的反应, 比通常我们从历史平均数据所认为或估计的要更为敏感。这种趋势有可能随着中国贸易结构的不断演变而继续。

近观贸易顺差……

过去 4 年间, 中国的贸易顺差猛增, 2006 年已达到了 2180 亿美元, 占 GDP 的 8% 以上, 而 2000 年至 2004 年期间平均只占 GDP 的 3% 左右。这种贸易顺差是由制造部门顺差的猛增所推进的。特别是, 机械、电子产品和运输设备占贸易顺差的一半以上, 仅仅几年前这些部门还是相当大的逆差。

贸易顺差的扩大主要是由进口的显著下滑所造成的, 2005 年初进口下滑开始大幅拖累进口增长。相反, 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 进口与出口的增长通常是同等的, 这与中国作为加工中心的地位相一致。中间品进口 (包括零部件和半成品) 下降得最大, 这解释了 2003 年至 2005 年期间总进口一半以上的下降, 且占了进出口增长率差距的最大部分。这种发展直接影响了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 并可能正在改变中国在地区生产链中的地位。尽管中国与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顺差继续增长, 但过去两年它与亚洲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 传统上是一种抵消, 在缩小。这已引起了一些亚洲经济体的关注, 特别是那些对中国出口是其近来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的经济体。

由于中国国内生产能力的提高使其有能力更多地依靠国内来源获得中间产品, 进口的下降发生在投资大幅增长期间 (见图 1)。在一些部门, 如钢铁和化学原料, 由于商品价格的攀升, 2003 年和 2004 年期间投资激增, 这产生了巨大的生产能力。而在其他一些部门, 如电子产品和机械设备, 外国直接投资 (FDI) 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反映了全球生产网络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更多的生产阶段转移到了中国。例如, 仅从中国台湾省转移进来的电子部门的直接投资就从 1999 年的 5.38 亿美元增加到 2005 年的 24 亿美元。许多部门的最终产品出口继续增长强劲,

这反映了国内生产能力的提高——尤其是家用电器、常用机械, 以及较弱一些的高技术产品, 如精密仪器——尽管其生产中所使用的中间投入品的进口近来有所下降。

“随着国内供给的扩大, 中国正逐步从简单组装业务转向更大范围地使用国内投入品的业务。”

这些发展凸现了中国在地区加工贸易中地位的变化。加工贸易类型从本质上是由中国海关官员基于税收目的而定义的贸易类型, 认识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它并不限于低附加值的组装业务上, 即所有原料由外国供应商提供。公司可以选择从海外进口全部或部分中间产品 (例如, 原材料、零部件、附件和包装材料), 从国内供应商那里获得剩余的中间产品, 并把最终产品再次出口, 其中进口的投入品免税。是进口还是从国内获得的决策取决于不同市场中产品的可获得性和相对价格, 这类似于常规进口品的决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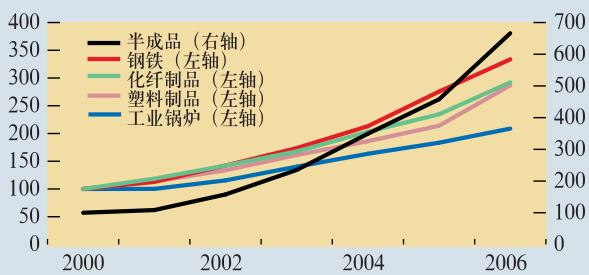
随着国内供给的扩大, 中国正逐步从简单组装业务转向更大范围地使用国内投入品的业务。简单组装业务的份额急剧下降, 2006 年仅占加工贸易顺差的 10% 左右, 而 20 世纪 90 年代末曾高达 30% 以上。相反, 后者的重要性却提高了。而且, 其边际收益——定义为每出口一美元产品的国内附加值, 或者贸易顺差除以出口额——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百分之十几提高到去年的 40% 左右, 这与出口品中国内比例的上升相一致 (见图 2)。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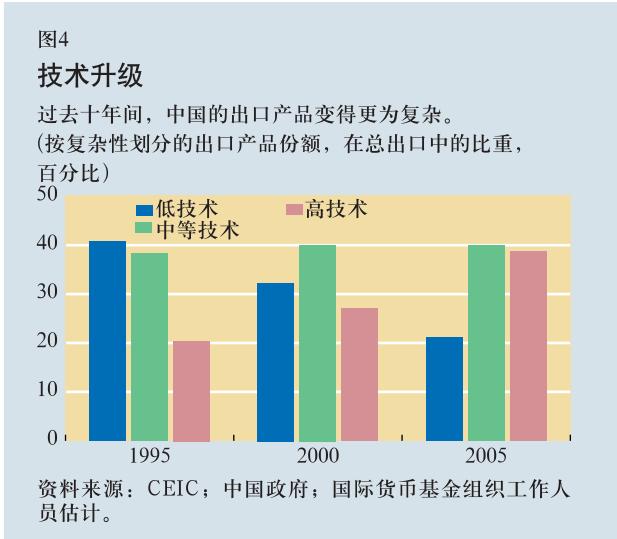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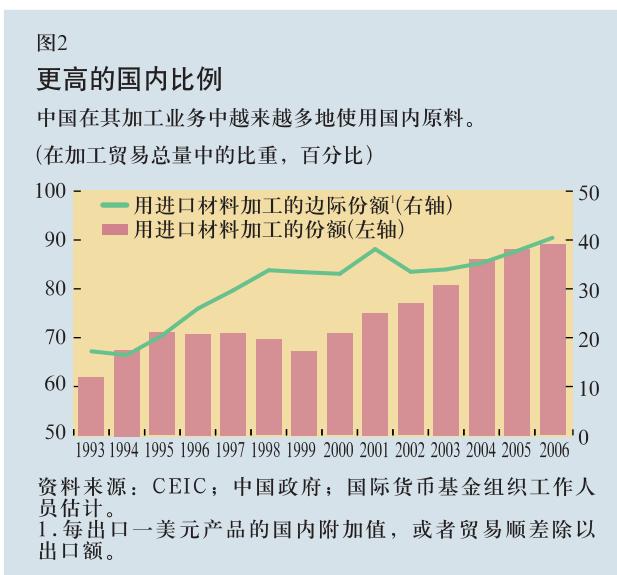
扩大范围

中国增强着其国内生产中间产品的能力。

(国内生产指数; 2000年=100)



资料来源: CEIC; 中国政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估计。



……及贸易构成

对资本品的大量国内投资、可观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以及技术升级，也已经改变了贸易的产品构成。尽管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包括服装和玩具）一度在中国出口中占据首要地位，过去十年这些产品在总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下降了20个百分点以上。资本品和零部件出口显著提高，在总出口中占40%以上，而十年前仅为10%—15%（见图3）。这种变化指出，中国的贸易和生产结构正转向更高的资本密集型和高技术产品。

更广泛地讲，过去十年中国的出口产品明显变得更为复杂了（见图4），进口产品也是如此。贸易复杂度的一个有用的测量标准是“Rodrik指数”：每种产品的指数是通过计算该产品各出口国的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的人均GDP的加权平均值而得出的，其中的权重是由每个国家所显示的比较优势而确定的。之后，总体贸易的复杂性指数由各产品的复杂性指数加权平均而得，其中权重由贸易份额确定（见Rodrik, 2006）。中国进口产品的复杂性要高于其出口的产品，其出口与进口复杂性之间持久的差距表明，中国在某些领域的国内生产继续依赖于进口（尤其是高技术产品）。

贸易平衡的敏感度

在考察出口产品中国内来源的提高和产品复杂性提高对贸易平衡应对外来冲击的敏感度的影响时，产生了两个问题。

进口是否已经不与出口相联系了呢？即人们是否已经预期，国内生产能力的提高会弱化中间产品进口与最终产品出口之间传统上非常紧密的联系呢？我们使用分解的贸易数据来考察电子、机械和运输设备行业中一组分部门的这种联系。样本量大约占中国零部件进口的一半左右。经过专门小组的估算，通过控制其他一些代表这些最终产品国内需求、以及投入品相对于中国价格的世界价格的变量，每个行业零部件的进口回归于该行业最终产品的出口。全部样本（1994—2005年）又被分为两个相同的期间，以评定进口与外国需求之间、以及进口与中国国内需求之间的联系强度是否发生了变化。

结果显示，全部样本期间，零部件的进口正相关于同一行业最终产品的出口，但在统计上，这种联系仅在这十年的前五年较强。与近年来零部件进口脱钩于最终产品出口这一假设相一致，后五年在统计上也没有明显的联系。这十年的后半段，进口投入品

更强地与国内需求联系在一起，这表明中国进口的零部件更多地用于满足国内生产需求（该需求随着国内生产能力的扩大而增长）。

因此，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主要作用是作为组装中心的传统观点不再像以前那样适用了。外部冲击可能会对中国的贸易平衡和国内经济产生更大的潜在影响，因为出口的减速并没有被相当程度的进口下降所抵消。同时，中国的进口受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而不是被直接用作出口产品的投入品。

复杂性是否影响了贸易的敏感度？即产品特征——特别是其复杂性的提高——是否已经影响了贸易流量对总体冲击的反应？我们再次使用分解的贸易数据来捕捉行业内部的潜在产品差异，这与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专业化程度要比行业水平好得多的观点相一致（参见 Feenstra 和 Rose, 2000; Schott, 2004）。用于检验该假设的统计框架是标准贸易模型的扩展，它把进出口与外部和国内需求以及实际有效汇率相联系（参见“为什么是实际汇率？”第 46 页），同时允许贸易弹性按产品复杂程度不同而不同。

结果显示，在出口方面，如果一种产品的复杂程度越高，那么该产品的出口随国外需求增加而增长的幅度越大，实际有效汇率升值而带来的出口下降幅度也会越大。在进口方面，如果一种产品的复杂程度越高，其进口随国内需求增加而增长的幅度越大，不过随着实际有效汇率升值而产生的进口增长幅度会越小。因此，复杂程度的提高也意味着，中国出口和贸易平衡对需求和价格波动的敏感度比过去更高了。

转变角色？

近年来，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提高，这反映在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迅猛的增长。上述分析表明，这种提高的很大部分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其出口产品的国内比例提高。而且，这里描述的两个关键趋势意味着，与通常所认为的状况相比，中国变得更易受到外部冲击的攻击，诸如实际汇率升值或外部需求的下降。这强调了需要尽快调整中国的增长模式，从依靠潜在不稳定的净出口转向由国内需求带动的更具持续性的发展路径。

中国的结构变化也对亚洲内部的贸易流量和地区生产网络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区域性影响。近年来，

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最大的出口市场。在推进地区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中国同样十分关键，特别是通过跨国公司作为跨境产业链的组成部分，以中间产品的形式发挥作用。事实上，过去十年，中间产品几乎占了亚洲内贸易增长的 3/5。但是，随着中国开始在生产链的更多环节实现专业化，中国从该地区进口的中间产品可能会开始下降。

“与通常所认为的状况相比，中国变得更易受到外部冲击的攻击，诸如实际汇率升值或外部需求的下降。”

从亚洲各国的角度来看，这些趋势可能为降低地区间的贸易联系。但是，中国国内市场的扩张潜力为该地区的其他经济体创造了机会，例如生产那些中国在近期不可能由国内生产的高技术产品。这些发展凸现了该地区经济体促进技术创新和推进质量链条的需要。同时，考虑到中国比较优势的演变以及作为结果其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东南亚的低收入国家可以取代中国在这些网络中的低端位置。

Li Cui,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的高级经济学家。

参考文献：

Cui, Li, and Murtaza Syed, 2007, “The Shifting Structure of China’s External Trad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thcoming IMF Working Paper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Feenstra, Robert, and Andrew Rose, 2000, “Putting Things in Order: Trade Dynamics and Product Cycl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82 (August), pp. 369–82.

Lemoine, Françoise, and Deniz Ünal-Kesenci, 2002,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Segmentation of Production Process,” *CEPII Working Paper No. 2002-02* (Paris: Centre d’études prospectives et d’informations internationales).

Rodrik, Dani, 2006, “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1947*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Schott, Peter, 2004, “Across-Product Versus Within-Product Specia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9, pp. 646–77.

Shu, Chang, and Raymond Yip, 2006, “Impact of Exchange Rate Movement on the Mainland Economy,” *China Economic Issues* No. 3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